

《上海学》集刊编委会

顾 问

马长林 王家范 冯绍霆 叶文心(美)
刘石吉(中国台湾) 安克强(法) 汤志钧 张忠民
张济顺 杨国强 沈祖炜 沈渭滨 苏基朗(中国香港)
周振鹤 罗苏文 胡志德(美) 高纲博文(日)
裴宜理(美)

编 委

马 军 王 健 冯志阳 叶 斌 江文君
张 剑 李志茗 沈 洁 邵 建 陈 同
周 武 施扣柱 段 炼 戴海斌

特邀编委

小浜正子(日) 王 多 王大学 包亚明 史通文(丹)
叶祝弟 刘士林 刘世军 孙安石(日) 毕克思(英)
邢建榕 张 宁(中国台湾) 张仲民 张利民 李长莉
杜 英 陈细晶(韩) 范 兵 段 钢 唐小兵
徐建刚 徐清泉 郭奇正(中国台湾) 高哲一(美)
屠启宇 萧小红(法) 萧 凌(美) 董建波 蒋 杰
黎志刚(澳) 戴鞍钢 魏定熙(美) 瞿 骏

主 编

周 武

主 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团队

地方精英与地缘纽带

——论上海的难民救助(1937—1940)*

[法]冯艺著 蒋杰 编译

1937年8月14日,日本海军对上海华界发起进攻,这再一次导致数量巨大的难民涌入外国租界。尽管上海的中国地方当局极力避免为日军发动战争提供借口,但日本的侵略还是随着一系列事件的接踵发生而爆发。事实上,自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已决定要对中国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但北方的几个省份还是在几个月内就落入日军之手。

与五年前的情况如出一辙,日本海军又一次首先发难。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中日两国土兵的一次致命交火——为日军首领提供了一个寻觅已久的开战借口。上海地区的外国势力,尤其是租界当局,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又一次不得不试图尽量降低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1937年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五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公共权力(租界当局)尽管进行了相互合作,并试图承担起战争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但它们的无能,使它们在这些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快被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所取代。

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这场战争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是为数众多的市民在一夜之间沦为难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忘记上海是一座由三个独立行政单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所组成的城市。每个单元由一个完

* 本文原载法国《中国研究》(*Études Chinoises*),1996年,第XV卷,第71—106页。原文标题为“*Élites Locales et Solidarités Régionales-L'aide aux Réfugiés à Shanghai (1937—1940)*”。为使译文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经作者同意,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内容进行了部分删改。同时,为便于研究者查询、核对文中的参考文献,凡西文文献,除《北华捷报》和《米勒氏评论报》外,一概保留原标题及出处。

全独立的行政实体所管辖^①。自从创立以来,外国租界总是在爆发天灾人祸的时候,成为难民的避难之所。这种既有赤贫者,又夹杂着富裕乡绅的经常性人口流动,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资本与动力。

自从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在中国北方爆发之后,上海市民已经被为数众多的社会团体发动起来,抗议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支持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关于这种社会动员,法租界警察以嘲讽的口吻写道“中国北方突如其来的战事,带给上海市民的首要影响,是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反应:各种委员会和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发展起来。”^②在上海,中国当局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他们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和避难所。但同时也极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但后者已经下定决心要寻找一个军事干涉的借口。经过了两次预警之后,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事件”中的死亡,最终引发了中日两国在上海的军事冲突。8 月 14 日,上海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经过三个月的激战,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最终被日军击溃而退出上海。华界完全落入日军之手,外国租界成为仅存的中国领土。12 月 12 日,南市的最后一批保卫者最终退入法租界寻求庇护。

本研究所关注的只是中日上海之战的一个侧面,即因军事冲突而沦为难民的受害者,在战争中的命运。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初,外国租界内已经容纳了成千上万需要救助的难民。我们试图对这一救援行动的规模作出描绘,并澄清为数众多的难民,在战争中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同时,我们也试图探讨外国租界当局对难民的态度,以及它们为应对这些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处于极端危机时期的难民救助组织,使我们可以观察和澄清中国社会传统——同业公会、同乡会——的角色。事实上,较之公共权力(租界当局),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以救助战争中的难民。

战争与难民问题:量化分析

难民潮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并不是一个 1937 年

① 正如鲁林(Alain Roux)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上海的历史并非起源于租界的建立,见 Alain, Roux, «Écrire l'histoire de Shanghai: un chantier qui s'ouvre», *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 340, 1993, pp.155—168; 关于上海的行政区域,见 Chen Yao-sheng, «The International Seulement of Shanghai», 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940 年博士论文; Sinclair, Michael, *The French Settlement of Shanghai on the Eve of the Révolution of 1911*, 斯坦福大学 1973 年博士论文以及 Henriot, Christian, *Shanghai 1927—1937. Élites locales et modernisation dans la Chine nationalist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1b。

② *Bulletin mensuel*[BM], juillet 1937, Garde municipale, Concession française, Service de la sûreté, 1937—1940, AD.

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言,许多城市的发展正得益于这种人口的定期迁移。尽管上海的包容性很强,这种移民现象仍导致了一种城市社区(société urbaine)的形成。这些社区由与本地社会的融合度相对有限的地区社会(communautés régionales)所构成^①。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些地区社会在难民救助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来自上海周边省份的移民,以“县”作为单位来进行地域的划分,而这些县在上海都有各自的组织。与移民相联系的同乡会或会馆在移民的接纳和“内地移民”在上海的融入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就是说,越在危机爆发的时刻,这些组织越能体现出在救助同乡和难民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随着小规模的冲突在上海的爆发,一部分对紧张局势有着清醒认识,并对日本的企图十分担忧的市民已经开始迁入租界。外交文件显示,从7月24日起,一些居住在闸北地区的富裕家庭已对时局发展做了最坏打算。为了避免像1932年那样陷在战场之中,这些家庭开始纷纷迁入租界。7月25日,这种自发性的搬迁行动,已经演化为一种事实上的人口迁徙。尽管这一趋势在26日出现了暂停,但日本将对中国发动惩罚性进攻的消息一经发布,迁移行动再次恢复。短短的几天内,共有2759辆卡车、2206辆小轿车、9375辆人力车和3761辆手推车,满载着杂七杂八便于搬运的物品进入租界^②。至7月30日,江湾和闸北地区所有富裕家庭几乎已经全部迁入租界地区避难^③。根据法租界警方的估计,约有50000—70000闸北居民迁入两租界^④。

在8月的最初几天,尽管人口的迁移还在继续,但已经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但8月6日,随着日本发布最后通牒的传言不断蔓延,16000余人在一夜之间涌入租界地区。上海东北部杨树浦地区的纺织工人也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进入租界避难。由于工人的缺乏,坐落这一地区的纺织厂一家接一家的关门歇业^⑤。根据法租界警察的报告,即使是华界政府也没有试图帮助市民恢复信心。它们甚至还为处于可能的交战地区内的居民的撤离提供便利。同时,华界当局也从江湾和南市地区撤离了自己的工作人员。人口的迁移最终在8月

①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②④ BM, juillet 1937.

③ Lettre du 30 juillet 1937, *Registre des correspondanc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AE)* 61.

⑤ Lettre du 6 août 1937, *Registre des correspondances du MAE* 61; BM, août 1937.

12日晚间完成^①。在这天夜间，中国的中央政府发布了中日关系备忘录并决定展开对日抗战^②。

由于涉及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群，同时还涉及一个不断贫困化的过程，战时上海的难民现象就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即使一部分市民成功逃离战祸，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将失去工作与收入来源。凭着微薄的积蓄，这些家庭可以在租界内支撑几个月。然而，一旦积蓄耗尽，他们将被投入难民的行列并成为慈善救援机构的负担^③。

在没有受到战祸波及的地区，工厂的关门歇业使数以万计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并大大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数量：“那些原本在租界工作的工人，也变成了缺衣少食的人……在约 5 418 家战前仍处于运转状态的工厂和企业中，坐落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并持续运转的仅有十分之一。据估计，战争爆发后失业工人数量已达到 200 000 至 300 000 之间。”^④1937 年 11 月，仅有五分之一的工人重新找到了工作。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局势开始逐渐好转。法租界内的工厂由 1937 年 8 月的 1 611 家增加至 1938 年 4 月时的 2 512 家^⑤。

由于战时上海难民的统计数据来自几个不同机构，因此很难得出难民人口的精确数字。此外，官方的数字事实上只统计了由慈善机构建立的难民营内的人口数量。与此同时，有大量未能得到收容的难民露宿街头，因此我们在表 1 中所提供的数据只是难民数字的一个大概估计，仅代表难民营内的难民数量。

事实上，公共租界所接纳的难民数量最多，这主要由于淞沪抗战，在蔓延至杨树浦和南市地区之前，首先在上海北部的闸北和虹口地区爆发。战争爆发之前，工部局并没有关闭华界通往租界的通道。而从华界南市地区通往法租界的大门，则在南市的战斗扩大后被关闭了。关于难民数量的第一批数字很晚才被报纸披露：8 月末时，公共租界内共设有超过 90 座难民营，5 万余名难民生活在这些难民营中。这一数字到 1937 年末时仍在持续增长，难民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尽管我们没有找到 1938 年 10 月之前的统计数据，但难民数量在 1938

① BM, juillet 1937;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江湾坐落于公共租界东北方向。枫林桥坐落在徐家汇附近，在 30 年代成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在地之前，曾长期作为淞沪行政督办外事办的所在地。

② BM, août 1937; Sun Youli,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88—90.

③ *Shanghai Times*, 26 novembre 1937.

④ BM, septembre 1937;《申报》1937 年 9 月 14 日。

⑤ BM, avril 1938.

表1 租界难民中难民数量的变迁

统计时间	年 代	公共租界		法 租 界	
		难民营	难民	难民营	难民
8月15日	1937	*	*	13	13 200
8月30日	1937	105	52 106	47	27 230
9月9日	1937	117	60 595	*	*
9月23日	1937	121	61 896	*	28 700
10月28日	1937	129	72 447	35	23 800
11月11日	1937	132	73 191	46	*
12月2日	1937	153	93 269	*	*
12月6日	1937	158	95 336	*	27 300
12月14日	1937	154	91 597	40	25 900
2月1日	1938	*	*	27	18 735
4月1日	1938	*	*	24	17 000
10月23日	1938	87	54 771	39	27 102
11月7日	1938	*	*	6	10 416
12月29日	1938	75	53 922	*	*
6月20日	1939	*	*	14	18 313
4月1日	1940	*	*	2	400
12月18日	1940	14	14 764	*	*

资料来源：《申报》，1937年8月27日、8月30日、9月5日、9月9日、9月23日、10月28日、11月11日、11月17日、11月23日、12月2日、12月6日、12月14日，1938年10月23日、12月29日、6月20日；BM, septembre 1937;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Rapport de police, 12 janvier 1938, Rapport de police, 6 mai 1938, Rapport de police 7 novembre 1938, Lettre du 14 juin 1938, AD, carton 91; BM, avril 1940; Public Health Report, 18 décembre 1940, Consular Trade Report, Shanghai, 1940, Box 1590。

年初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减少。那时公共租界内仅有75座难民营，共容纳难民53 000余人。6个月后，公共租界内的难民营几乎全部消失了（仅存14座）。尽管难民数字是不可忽视的，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难民营所容纳的人口数量。

来自报纸和外交档案中的法租界难民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在战争爆发之初，法租界内设有难民营13座，容纳难民13 000余人。尽管缺乏精确的数字，但直至1937年末，界内的难民营数量仍保持着上升的趋势（40座）。根据法租界警察的统计，界内难民的人数几乎超过3万大关。报纸公布的数字则更高，

至 1937 年 12 月时已经超过 5 万人^①。根据统计，战前法租界内共有 4 900 至 5 500 所空置房屋。在战争爆发后短短 15 天内，4 457 所即被逃难家庭租用^②。随着人口疏散行动的开始，从 9 月 11 日起，难民人数的增加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状态。但随着南市战斗的打响，法租界又出现了难民大量增加的现象。此后，随着难民陆续迁入“饶神父安全区”，法租界内的难民数量再次减少^③。至 1938 年 10 月末，界内仍有难民营 39 座，容纳难民约 27 000 人。两周后，仍有 10 146 名难民生活在 8 座主要的难民营内。

由于没有任何有能力的政治机构对华界地区难民营的设立进行调查和统计，因此，该区域内的难民情况就显得更为模糊不清。根据《申报》1937 年 8 月 28 日的报道，在上海北部战区之内，约有 10 万名难民^④。这些家庭或是自己选择留守家园，或是陷在战区内无法逃出。在南部，共设有 30 余座难民营，共计容纳难民 90 000 余人。另一份评估显示，难民的数量在一个月后已经增至 10 万人^⑤。这说明在上海的不同地区，聚集着由不同组织所负责的难民群体。随着饶神父安全区的设立，南市难民的情况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共计 360 000 名难民进入这一难民营寻求庇护^⑥。

对战时上海难民人数进行整体评估是一种极易发生谬误的尝试。由租界市政当局所提供的数据，既没有把那些借住在父母家中或临时租赁房屋的难民计入其中，也没有把那些露宿街头的难民计入统计。《申报》在 1937 年 8 月 31 日估计，上海总共有 70 万人在战争期间进行了迁移。11 月，《北华捷报》也给出了一个类似的数字：大约有 60 万难民依靠父母、亲友和慈善者的帮助以维持生计^⑦。法租界警察估计，战争爆发后界内人口增长了 414 449 人，这使得整个

① Rapport de police, 12 janvier 1938, Archives diplomatiques [AD], Nantes, carton 91 («Affaires locales chinoises»); 《申报》1937 年 12 月 14 日。

② Lettre du commandant des forces françaises à Shanghai, 18 octobre 1937;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③ Rapport de police, 12 janvier 1938, AD, carton 91.

④ 《申报》1937 年 8 月 28 日。

⑤ 《申报》1937 年 8 月 15 日、9 月 13 日。

⑥ Transpacific News Service, 25 mai 1938. 饶神父安全区，得名于它的创办者耶稣会神父饶家驹。建立这一特殊区域的目的，在于将上海老城厢三分之一的区域变为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为那些深陷战区和无法进入租界的难民，提供一个安全区域。安全区由一个负责联络日本占领军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委员会所管理。饶神父主要依靠少量得到日军认可的志愿者，在区内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维持安全区的日常运转。见 The Story of the Jacquinot Zone, Shanghai, Nanshi nanqu jiancha weiyuanhui, 1938 一书。

⑦ 《北华捷报》1937 年 12 月 20 日。

法租界内的人口数量增加为 1 050 000 或 1 200 000 人^①。该年 11 月,一封领事信件指出法租界内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1 500 000 人,而此前的数量仅为 500 000 人左右。至 1938 年 10 月中旬,整个上海仍有难民约 100 万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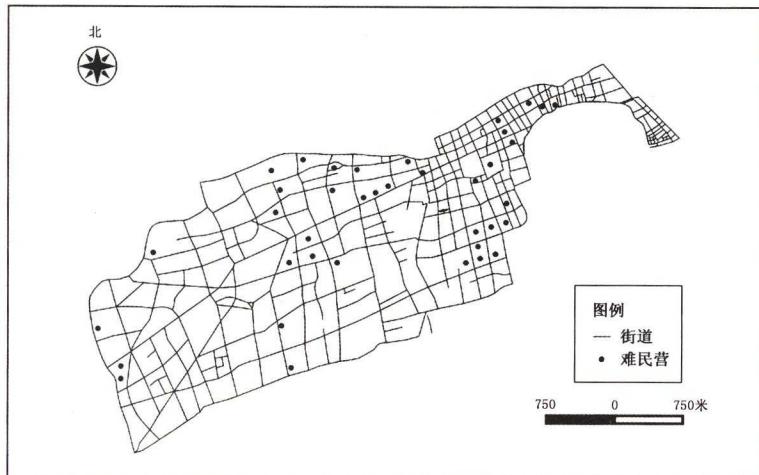


图 1 上海法租界难民营的分布^③

资料来源:根据原文第 72 页地图绘制。

1938 年 4 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Fédération des organisations de bienfaisance de Shanghai)指出,他们所负责的 71 座难民营,共接纳难民 39 149 人^④。同年 9 月,一份法租界警察报告显示,上海共有 110 000 名难民生活在由 12 个不同机构所负责的 177 所难民营中^⑤。此外,中日双方的军事行动还将上海周边地区的难民引入上海。根据《中国经济与统计评论》1938 年 9 月的估计,上海的人口已经达到 550 万人。其中 70% 生活在租界之中。这一数字是和平时期的两倍(1937 年的上海的人口数量约为 3 900 000 人)。尽管如此,很大部分难民似乎已经找到了生计^⑥。

①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② 《申报》1937 年 8 月 31 日、10 月 16 日。

③ 译者注。

④ Lettre de la Fédération, 23 avril 1938, AD, carton 91.

⑤ Télégramme(?) en anglais, 1^{er} sept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⑥ BM, septembre 1938;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0 页,表 1。



图2 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第二难民收容所①

资料来源：“抗战初期的难民”，上海档案馆，SMA：H1-1-14-1129。

尽管公共权力(租界当局)和救援机构努力帮助难民重返家园，并在那里重新开始生活，但难民人数的减少却十分缓慢②。事实上，考虑到中日战争波及很多省份，尤其是上海周边的省份。在这些地区内，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面临着巨大威胁。因此，很少有难民愿意返回家乡。正如难民在日军所占领的华界无法得到安全保障，因此他们更愿意待在租界。尽管他们在租界的处境十分糟糕，但至少生命不会受到威胁。1940年4月，中日战争爆发三年之后，上海的慈善机构(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上海难民救济会、救世军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部)启动最后一批难民的疏散工作。4月末，仅存的30余所难民营被全部解散。35 000余名难民每人获得了15元的返乡交通补贴和3元的就餐补贴③。

除了被难民营收容的难民外，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充斥着大街小巷。公共权力(租界当局)担心这种对公共空间的侵占，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卫生造成危害。因此，一些公共建筑(主要是学校)和娱乐场所被征用，以接纳和收容无家

① 译者注。

② 至1937年11月底，约有375 000难民被从上海疏散，但仍有近70万难民生活在那。见《密勒氏评论报》1937年12月4日，第2页。

③ BM, avril, 1940.

可归的难民。1937年8月15日,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将所有电影院和娱乐场所关闭,并将它们改建为难民收容中心。而这些难民收容机构的管理,则委托给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①。1937年8月,法租界警察列举了一份难民营清单,通过这份清单,可以看到被征用为难民营的场所的多样性。这些场所包括:大世界、新世界、荣金大戏院、恩派亚电影院、震旦大学、四明公所以及一些寺庙等^②。然而,在这些地方设立难民营也造成了安全(火警)和卫生(缺乏卫生设施)问题。当局最后不得不利用大片或整理过,或未经整理的空地,来容纳数量最大的难民群体。

至1937年12月中旬,两租界内共计设有难民营194所。租界当局发布的一份清单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这些难民营的情况。公共租界西区(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75所难民营内,容纳难民共计46 859人。中区的60所难民营,共收容难民31 107人。北区共有难民营18所,难民13 631人。法租界当局没有发布相关信息。但由于它具有最多的可利用的空地,所以法租界内设立了战时上海数量最多的难民营。尽管它的中区在平日已人满为患,但这时也容纳了数量可观的难民。难民营的规模差别很大,容纳难民的数量从19人至17 000人不等。最大的一所难民营设在徐家汇地区的交通大学内。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难民(54 000人)主要被集中在11所较大的难民营内(大学、教堂和庙宇等)^③。

随着局势的稳定,一部分难民开始慢慢返回战前的居住地。1938年2月7日,日军重新开放了虹口和杨树浦地区。只要持有通行证并通过警察的检查就可进入上述地区。一个月后,在同样的条件下,市民也可以进入闸北^④。至1940年2、3月间,所有设置在租界与华界间的来往限制被最终解除。然而,如果要居住在以上地区,必须领取“良民证”。此时,两租界内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390万人,远远超过战前的人口数量(1937年时约为170万人)^⑤。

① 《申报》1937年8月15日。

②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③ 《申报》1937年12月24日。

④ BM, février 1938.从1938年秋季起,22 800个家庭开始返回虹口地区生活,由此日本当局受理了86 000份通行证申请。此外,195 000人由于工作原因,被允许在租界与日占区之间自由往来。1939年4月,杨树浦的居民人数已经到达101 771人,日军当局发放了305 076份通行证。此外,根据来自日本海军的信息,至1939年10月20日,约有352 390人重新前往虹口地区。这些数据显示,一部分从虹口迁出的人们,对于是否返回该地区仍处于迟疑状态。见BM, octobre 1938, avril 1939, novembre 1939。

⑤ BM, mars 1940, avril 194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第90页,表1。

救援机构

随着中日两国军队在 1937 年 8 月 14 日进入大规模交战状态，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被席卷上海的战火，人为地变成了一座“孤岛”。与 1932 年的淞沪抗战不同，那时交战仅仅在华界爆发。在 1937 年的战事中，中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向驻有日本海军的租界地区实施炮击和轰炸，这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救援机构开展难民救助的难度^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公共权力是指两个租界当局。事实上，中日两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鏖战的 8 月至 11 月间，华界政府主要忙于军务。随着国军的溃败和从上海的撤退，由俞鸿钧所领导的上海特别市政府也迁往了内地。尽管宣布中立，但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仍被深深卷入战争。这迫使外国当局考虑撤侨行动，其中只有法国政府没有这样做^②。

随着战争的爆发，租界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宵禁令也时常在不同街区发布^③。法租界当局不仅在租界四周部署了千余名安南士兵，更多的增援部队也在印度支那地区待命，以阻止租界内的反日民族主义运动和保持租界的中立^④。两租界当局还在与华界毗邻的地区修筑了大量由沙袋和铁丝网构成的防御工事。警察、外国驻沪防军和义勇队也担负着保卫租界的责任^⑤。尽管如此，公共租界的军事和警察力量仍无法进入日军控制的租界东区（杨树浦）和北区（虹口）。

在租界内部，当局的两个主要隐忧，来自公共秩序的维持和卫生防疫问题。一切与难民相关的问题都会首先从这两点出发进行考虑。事实上，租界当局能够支配的资源相当有限，因此根本没有多余的公共开支可以用来救援难民。所以，租界当局的首脑从来没有考虑承担起难民营的组织工作。他们选择将主要

①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一次轰炸失误，导致数以千计的难民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附近被炸身亡。

② Lettre du consul de France, 28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1937 年 9 月初，美国政府已经撤离了近 2 000 名妇女和儿童。见 Lettre, The American Red Cross, 3 septembre 1937, State Department, Décimal Files 893.48/1182。

③ 在被战祸波及的地区（虹口、苏州河北岸），每天 18 时开始实施宵禁。一个月后，实施宵禁的时间变为 22 点，后又改为 22 点 30 分。从 1938 年 2 月起，两租界的宵禁时间为晚间 23 点 30 分至凌晨 5 点。见《申报》1937 年 9 月 15 日；BM, février 1938。

④ 《申报》1937 年 8 月 19 日、8 月 21 日。

⑤ 《申报》1937 年 9 月 1 日。

的精力集中在三个领域：公共秩序、卫生防疫和物资供给。这表明，对于秩序和卫生的忧虑将租界当局引向了一种极端官僚主义的无情，同时也导致他们毫不考虑难民的死活。

战争爆发之初，工部局对第一批到来的难民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然而，大量缺衣少食的人群的涌入，很快给市政管理提出了难题。工部局随即决定，即便出于人道主义，也不能再继续接收新的难民，随即关闭了所有通往租界的入口。即便如此，租界内的卫生状况仍在恶化，基本的食物供给也变得越发困难^①。此外，大量难民糟糕的健康状况使租界内的医院人满为患。因此，建立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通行证制度，不仅可以使租界当局有效地解决难民问题，而且可以迫使慈善机构尽快将界内的难民疏散到外地^②。所以，即使战争就在紧邻租界的闸北地区进行，尽管数以千计的难民已经被驱赶到租界的铁门之外，租界当局始终拒绝接纳他们。

法租界的铁门从战争爆发之初就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有十道精心设计的铁门可以帮助市民通过^③。尽管如此，法租界警察仍持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尽



图3 被租界当局拒绝进入的难民^④

资料来源：“抗战初期的难民”，上海档案馆，SMA：H1-1-14-1129。

① 战争影响了约 50 万农民的夏收。见 Shanghai US Consulate, Telegram, 21 janvier 1938, State Department, Décimal Files 893.48/1430。

② 《申报》1937 年 8 月 24 日。

③ 《申报》1937 年 8 月 16 日。

④ 译者注。

量把那些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8月17日、18日和19日(夜间),法租界警察将4万余名难民驱逐到南市:“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执行这有点令人不快的任务。”^①另一份报告指出:“现在仍有3万到4万名露宿在里弄中的难民等待我们清理。”^②8月28日,日军对南市地区进行了轰炸,3万余名试图进入法租界的难民被警察拒之门外^③。

要进入租界避难,难民必须放弃所携带的家具和其他物品。进入租界的人只能随身携带一些个人用品,而且必须证明在租界内拥有住所^④。为了阻止难民偷偷进入租界,警察始终值守在岗位上,夜间也不断进行巡逻。为了舒缓警察的工作压力,法租界当局不得不投入更多人力到这项工作中去。法国领事也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辩解:“我们必须管理比和平时期三倍还要多的人口。这些人在可疑分子的挑唆下可能会生出事端,在贫穷的压力下也可能变得十分危险。”^⑤除了严格控制难民的进入之外,警察还必须负责将流落在大街小巷的难民集中起来送进难民营。当局极力避免公共秩序的失控,并尽力将难民送交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处理^⑥。

面对救援机构的不断增多的现实,两租界当局组建了一个难民问题协商委员会,以处理难民救援问题。它们试图将这一机构变为一个统一管理一切涉及难民接收和疏散事务的工具^⑦。在法租界,“粮食调剂委员会”也极力避免与小规模救援组织进行交涉,它们试图找到一种合理管理界内所有可用于难民救助的资源的方式^⑧。除此而外,租界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介入了难民的救助。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与日军协商进入战区救出身陷其中的难民,或者通过水路将难民从上海疏散到外地。外国驻沪防军也派遣部队保护难民营的安全^⑨。

公共权力(租界当局)还必须面对卫生防疫问题。正如所有上海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传染病对这座城市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接种疫苗的方

①③⑧ 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25 août 1937, AD, carton 83.

②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④ 《申报》1937年8月30日;Rapport de police, 15 octobre 1937, AD, carton 91.

⑤ Lettre du 9 décembre 1937, Registre des correspondances avec le MAE 61(3).当时法租界巡捕制服队的人数为818人,另有俄捕连巡捕376人。此外,领事又雇用了200名越南人、200名中国人和50名侦探。

⑥ 《申报》1937年10月16日。

⑦ 见 Procès-verbal de la Commission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séance du 30 août 1937, ordonnances consulaires, volume 181;《申报》1937年9月29日。

⑨ 《申报》1937年11月3日。

式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疫情的爆发^①。1937年9月,一个主要针对来自上海北部战区的难民的卫生检查体系被建立起来。只有那些通过检疫和疫苗接种的难民,才可以进入难民营避难^②。但上述措施只涉及很少一部分难民。卫生防疫的另一个挑战来自难民的死亡,尤其是儿童的死亡。慈善机构每天大约要收殓约300具儿童和100具成人的遗体^③。在这一领域,租界当局完全依赖慈善组织进行工作。

如同对骚乱的担忧一样,对防疫问题的担心使租界当局决定重组难民收容机构,以裁汰那些在市政管理机构看来规模小、管理差和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小难民营。淞沪抗战甫一结束,法租界警察就要求各个慈善组织将难民全部迁往由国际红十字会管理的规模较大的难民营内^④。他们希望“将法租界的空余土地从难民营的占领下解放出来”^⑤。与此同时,由于公共租界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警察提醒法国领事注意法租界在转移难民时面临的风险^⑥。他们也建议慈善机构在进行难民迁移时,提前向当局报告它们的意图^⑦。

至1938年5月,警察不断强调裁汰不达标的小难民营、聚集散落在大街小巷的难民或驱逐聚集在民宅内的难民所遭遇的压力。他们严厉地批评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国会,认为这一机构既缺乏有效的管理,卫生防疫也难以令人满意。难民营中还时常发生骚乱、敲诈和克扣食物的情况^⑧。在一份提交给市政当局的报告中,警察的态度十分明确:“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必须从我们的土地上遣散2500名左右的难民。”^⑨因此,很多规模较大的难民营开始在租界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西区,被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国会所雇用的苦力

① 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对卫生的担忧和保护公共健康的考虑,公共租界的政治和市政权力在19世纪末得到很大的强化。此后,为了对抗时常侵袭上海的传染病,如霍乱等,当局也在各个领域(建筑、食品检验、检疫等)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见 MacPherson, Kerrie L.,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及 Henriot, 1991b, chap.8。

② 《申报》1937年9月10日。

③ 《申报》1937年9月17日。

④ 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27 décembre 1937, AD, carton 83.

⑤ BM, février 1938.

⑥ Rapport de police, 1^{er} avril 1938, AD, carton 91.

⑦ Rapport de police, 15 avril 1938, AD, carton 91.

⑧ 1938年12月,一个小型的诈骗集团被法租界警察破获。“大宏”(音译)难民营的一个组长,把从市场上购入的普通商品,加盖难民营印章后,混在难民营的产品中,以原价值的三倍甚至四倍出售,谋取暴利。见 Rapport de police, 6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⑨ Rapport de police, 6 mai 1938, AD, carton 91.

建立起来^①。然而,这些难民营所容纳的人口很快就达到了极限。因此,对于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难民营的清理工作,至该年的7月末就暂停了^②。

救援组织的动员

淞沪抗战的爆发和大量市民在短时间内沦为难民的现实,为上海中国社群的内部动员提供了巨大动力。在最初的救援行动中,当然会发现红十字会和红卐字会这些专业慈善组织的身影。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那些全力开展救援行动的中国传统慈善组织。最后,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还能看到由同业公会和同乡会所发起的难民救助行动。这些机构在救援组织工作和难民救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几乎传统上活跃于上海社会的所有组织都加入了难民救援行动。妇女联合会在1937年11月15日成立了一个叫作“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组织^③。上海的基督教联合组织也成立了一个“非常时期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共设立了10所难民营,收容难民近4 000人。这些难民营都被设在教堂和教会学校内^④。一些职业联合会也被动员起来,但报纸无疑没有正确报道它们的救援行动^⑤。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外国慈善组织都在一个统一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救援。

面对救援活动不断增加的现实,为了在不同救援机构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1937年8月13日正式成立。这一机构由“华洋义赈会”(它原本是一个为救济天津地区的战争灾民而建立的慈善组织),与其他七个不同组织联合组成(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红卐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慈善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佛教联合会)^⑥。该机构一经成立,上海地区大部分慈善救济组织都迅速加入,特别是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医药协会和各地同乡会^⑦。

① 《Local News and Translation Service》, n° 7 (24 juillet 1938), AD, carton 91.

② Rapport de police, 20 juillet 1938, AD, carton 91.

③ 这个组织拥有十余个会员机构,如“妇女结志会”(音译)、“中国妇女社”与“女青年会”等,见Rapport de police, 3 août 1938, AD, carton 91。

④ 《申报》1937年9月5日。

⑤ 《申报》1937年11月18日、12月9日。

⑥ Lettre du CISS au consul de France, 24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⑦ 《申报》1937年8月25日。

根据饶神父向法租界的汇报，上海国际救济会的三名有力的女性领导人，把所有难民都集中在难民营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难民集中起来，向他们提供援助以及逐步把他们疏散回乡。这一组织要求上海的三个市政当局通力合作，建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以负责难民的疏散工作。这一办公室最好能与诸如国际红十字会这样的大机构进行合作^①。这一办公室还要求日本保障难民运送活动的安全。上海国际救济会则主要负责难民登记、检查难民出入以及与市政当局进行沟通联络。最后，所有难民营必须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登记注册，违者将遭到解散的处罚^②。

上海国际救济会负责接收了数量最多的难民。8月12日时，他们已经建立5座难民营。几天后，他们就总共建立了59所难民营。至8月21日，由这一机构所负责的4万多名难民，分布在全市的百余所难民营中。然而，他们也呼吁上海的其他慈善组织担负起接收难民和为他们提供饮食的责任^③。由于租界当局严格控制难民进入租界，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华界和租界的边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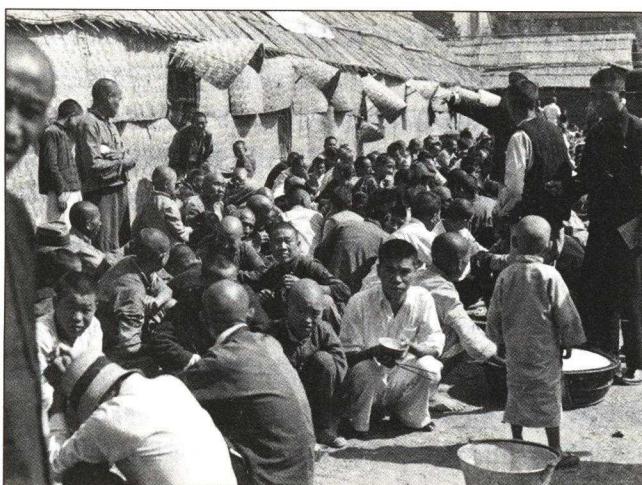


图4 难民营内的饮食^④

资料来源：“抗战初期的难民”，上海档案馆，SMA：H1-1-14-1129。

① 为了协调难民的疏散工作以及与国际组织的接触，上海创立了一个包括三个市政当局和不同救援组织代表的委员会。见 Shanghai US Consulate, 6 septembre 1937, State Department, Décimal Files 893.48/1255。

② 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30 août 1937, AD, carton 83.

③ 《申报》1937年8月21日、9月20日。

④ 译者注。

带,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建立了大量难民营^①。尽管国际红十字会不负责难民营管理的具体事务,但它向难民营负责组织提供食物和其他一切必要的帮助^②。这种物资援助直到1938年10月才终止。

上海的中国慈善团体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统一领导。这是一个由上海资产阶级上层所控制的组织。事实上,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救济组织的努力,部分地遭遇了来自政治层面的挑战。在战争开始之初,社会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其他一些组织联合创立了“难民救济委员会”(Comité de secours aux réfugiés)。日军占领华界后,这一机构更名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难民救济委员会”(Bureau divisionnaire de la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de bienveillance de Shanghai)。它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相互独立。千余名原市政府和政治机构中的人员被安置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中,他们的政治斗争使这一机构遭到很大损失,以至于伪政府一度试图控制它。成立于1938年10月的“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Fédération de secours aux réfugiés)也试图控制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但遭到工作人员的抵制。法租界警察曾对这一机构进行了批评,指责他们管理难民营的目的在于在那里制造政治动荡^③。

上海难民营的统一管理从未实现过。1938年6月,法租界警察指出,上海的慈善团体开始慢慢向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移交难民营的管理权^④。但个别慈善救援组织仍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从1938年5月的一份警务报告中,可以发现上海有三个最主要的难民救助机构: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每个机构都管理着自己的难民营。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所由“江苏五县同乡会”所支持的难民营^⑤。这所难民营事实上是由上海一些有影响力资产阶级所管理,它获得了警察的谅解^⑥。

至1938年夏季,国际红十字会已停止向上海的难民营提供物资援助,同时

① 《申报》1937年9月20日。

② 《北华捷报》1938年1月22日。

③ Rapport de police, 1^{er} avril 1938, AD, carton 91; article traduit du Journal sino-américain, 23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④ BM, juin 1938.

⑤ Rapport de police, 6 mai 1938, AD, carton 91. 五县的名称见下文同乡会列表。

⑥ 该同乡会由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C.C. Wu(?)、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交通银行经理张寿民(音译)、江苏高等法院前院长徐秋风(音译)管理,见Rapport de police, 29 novembre 1938, AD, carton 91.

很快结束了在上海的救援行动。为了填补国际红十字会离开后的空白，上海资产阶级领袖，同时也是租界当局“红人”的虞洽卿，在该年 10 月 18 日发起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该组织被称作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它的宗旨是“通过各种合理的方法，从上海和其他地方获得捐助，以救助中日战争所造成的难民，并对他们进行安置”。这一联合会的管理机构由国际和国内负责难民救济的机关、组织的代表组成^①。

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宣称他们将负责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江苏五县同乡会所管理的难民营的食物供给。但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也负责由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所管理的难民营。然而，由于来自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的资金已成为唯一的救援资金，可以想象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营也应该得到来自这个机构的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由上海资产阶级上层所建立的机构，才可以居于上海其他救援组织之上，以表明它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弥补国际红十字会离开后的位置。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计划每月投入 30 万元救援经费。他们要求“上海商会”命令“业主联合会”从员工每月的薪水中扣除百分之一作为救助资金。此外，在一个“难民救助与节约委员会”的主持之下，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还发起了一个认捐运动^②。

在最为积极的救援组织中，我们自然而然会谈到上海为数众多的同乡团体。伊懋可、罗威廉和顾德曼的作品已经对同乡会组织在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了很好的阐述^③。在叛乱、战争发生的危急时刻，这些机构总是可以及时地动员起来为同乡提供帮助。表 2 列举了报纸和档案中所揭示的，在难民救助中最为积极的同乡团体。

大多数的同乡会组织尽力将难民安置在难民营中，有时也会临时在通往家乡最近的道路上接收难民^④。每个组织都会对来自自己家乡的“侨民”负责，并维持他们自己创办的难民营。战争甫一打响，江苏五县同乡会就开设了一所难

① BM, octobre 1938; Charte de la FSR, AD, carton 91.

② Rapport de police, 18 nov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③ 见 Elvin, Mark,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 剑桥大学 1967 年博士学位论文;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we, William,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é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④ 《申报》1937 年 8 月 16 日。

表 2 同乡会统计表

	名 称	省 份
1	宁波同乡会	浙江
2	余姚同乡会	浙江
3	宜兴同乡会	江苏
4	镇江、丹阳、金坛、溧阳、扬州五县同乡会	江苏
5	常州同乡会	江苏
6	无锡、江阴同乡会	江苏
7	吴江同乡会	江苏
8	湖州同乡会	浙江
9	台州同乡会	浙江
10	广东同乡会	广东
11	绍兴同乡会	浙江
12	湖 社	浙江
13	泉漳同乡会	福建
14	粤同乡会	广东
15	太嘉同乡会	江苏
16	江西同乡会	江西
17	浦东同乡会	上海
18	江阴同乡会	江苏
19	海门同乡会	江苏
20	慈余同乡会	浙江
21	漳 州	福建

民营，专门接收籍贯为镇江、丹阳、金坛、溧阳、扬州五县的难民。他们还在上海各区开设五所办事处，以最大限度地联络到来自上述地区的难民，并尽量将他们自己的“侨民”疏散回乡^①。由旅沪福建人所设立的“晋惠公所”也在公所在地开设了一所难民营，此外他们还在附近的仓库租用了五间办公室，用于安置难民^②。同乡会组织从自己的基金中提取必要的经费用于维持难民营的运

① Procès-verbal du Comité de ravitaillement, 6 septembre 1937, AD, carton 83.

② Lettre, 7 décembre 1938, Rapport de police, 20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转。同时，也向那些没有受到战火波及的同乡会员募集资金。此外，他们还从红十字会和上海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获取食品援助。同乡会组织与家乡所保持的特殊联系，使它们可以在最佳时机组织难民运送或就地安置难民。

自然而然，难民的数量与他们的地区社会在上海规模成正比。因此，籍贯属于广东的难民自然比江西或四川的多。那些移民势力在上海强大的省份，如江苏和浙江，他们的地区社会常常以更小的县或几个县为单位进行划分。难民的数量也与居住的街区是否受到战火波及息息相关。广东籍的难民主要来自他们所聚居的虹口地区，因为这里受到了严重的战祸波及。而苏北籍的难民则主要来自被战火侵袭的闸北和杨树浦地区。在很多情况下，同乡会会联合起来接收难民，同时也会接收那些来自临县，但在上海没有同乡会组织的难民^①。

同乡会接受的难民的人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江西同乡会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内，就接收了500名难民。吴江同乡会也接收了几百人^②。在战争爆发初期，常州同乡会每天都收容难民几百人^③。江阴同乡会接收的难民人数为4000人，广东和无锡同乡会各接收了5000人。浦东同乡会则接收了约5万人^④。上海最富有的宁波同乡会，在8月16日已经开设了6所难民营，并将2000余名难民送回宁波。每天他们都会用两艘船将难民从上海送往家乡。从8月19日至31日，共有35000名难民从法租界外滩码头离开上海，其中90%以上被送往了宁波^⑤。到10月时，他们已经管理着14所难民营，并将15000余人送离了上海^⑥。同样富裕的绍兴同乡会，共向同乡难民发送了7000张船票^⑦。广东同乡会也开设了很多难民营，并在10月将他们的“侨民”送出上海^⑧。

难民救援资金的首要来源是从市民那里募集而来的捐款。只有国际红十字会和饶神父安全区（在有限程度上）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并获得来自国外的救援资金。救援机构呼吁社会大众慷慨解囊，为难民救援提供资金。为此，上海国际救济会专门设立了“捐募委员会”^⑨。报刊和电台也不断播发来自不同

① 《申报》1937年9月20日、9月25日。

② 《申报》1937年8月20日、9月28日。

③ 《申报》1937年8月21日。

④ 《申报》1937年8月17日、8月19日、8月21日、9月24日、11月15日。

⑤ Rapport de police, 31 août 1937, AD, carton 91.

⑥ 《申报》1937年8月19日、8月21日、10月8日。

⑦ 《申报》1937年8月28日。

⑧ 《申报》1937年10月18日。

⑨ 《申报》1937年10月29日。

救援机构的募捐广告^①。1937年底,一个叫作“每日一角钱”的运动被发动起来,以帮助募集救援资金^②。尽管规模较小,但上海基督教促进会也发起来一个类似的“分文救济运动”^③。艺术家们则通过组织戏剧、音乐会和话剧表演来为救援行动筹集善款^④。

事实上,维持数量庞大的难民的饮食问题,也构成了救援组织无法承担的重负。一份警务报告列举了维持难民饮食所必须的开支。1937年8月,江南教会(Mission du Jiangnan)在震旦大学经过整理的空地上,收容了2 500名难民。此外,在教会所在地也收容了一批数量不详的难民。徐家汇难民民营内收容的难民数量为8 179人。另外,他们还为2 428名被安置在难民民营外的难民提供援助。江南教会在该月的支出共计150 235元,其中包括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和每个难民每月1.4元的生活费^⑤。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的数字与此相近。他们每月花费在每个难民饮食上的费用为1.9元^⑥。在1938年9月,维持全市13万名难民每月的饮食,需要花费39万元。然而,救援机构每月募集来的收入仅有111 000元。因此,上海难民救援资金面临着巨大赤字。此外,由于缺乏经费,国际红十字会也在该年10月宣布结束在上海的救援行动^⑦。

为了弥补难民民营的资金不足,同时迫使那些游手好闲的难民进行劳动,救援组织开始尝试开展一些生产活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为那些适合进行生产的难民,建立了一所难民民营。他们在那接受一定的职业培训,并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工资(每月7元)^⑧。上海国际难民救济会也为难民开设了一个作坊,难民在那里进行生产,每月可以获得15元的工资^⑨。他们还与其他的救济组织一起成立了“难民工作设计委员会”^⑩。一些组织积极开展难民的职业

① 《申报》1937年9月21日。

② 《申报》1937年11月19日、12月1日、12月11日、12月13日。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为难民提供食物。要实现这一目标,只需要四分之一的市民每天捐献一角钱。

③ 《申报》1937年12月1日。

④ 《申报》1937年11月1日、11月11日;Lettre du Comité de secours, 10 février 1938, AD, carton 91。

⑤ Note de police, 7 mai 1938, AD, carton 91.

⑥ Rapport de police, 18 novembre 1938, AD, carton 91;另见Shanghai US Consulate, Telegram, 19 juillet 1937, State Department, Décimal Files 893.48/1392, et Nagler, 1937—1938.

⑦ BM, septembre 1938.

⑧ 《申报》1937年11月9日。

⑨ 《申报》1937年10月15日。

⑩ 《申报》1937年10月27日、11月4日。

调查，并向工厂、企业进行推荐^①。基督教青年会专门为女性难民的职业培训和求职建立了一个中心^②。

在上海著名慈善家王一亭和著名的资产阶级人物冯少山的发起下，一个旨在为难民屯垦提供土地和工具的组织被创立起来。这个组织在江苏的两个县境内获得了 35 000 亩土地，并对愿意前往屯垦的难民进行登记注册。第一批千余名难民在 1937 年 11 月底，前往两县进行屯垦^③。一个面积约为 27 000 亩的农场被开发以用于种植农作物。江苏五县同乡会的报告这样写道：“大量难民无以为生。所以我们考虑建立一个手工作坊，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以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无限期地收容他们，而如果有一天我们无法继续维持他们的生计，这很容易给这座城市带来严重的麻烦。”^④这一机构于是开设了一个包括了 3 个作坊的小型工厂^⑤。这一措施很好地反映了救援机构的总体态度，他们并不愿在救援活动中，总是扮演一个救助者的角色。

至 1938 年 9 月，难民救援机构已为 70% 的难民提供了工作，他们生产公文包、袋子、手套、纸花、服装、刺绣以及藤木制品^⑥。难民所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被外销，部分地补充了难民营的资金不足。一些难民营还开设了销售合作社^⑦。然而，难民营的免费食宿不是一种永恒的权利。一旦难民重新找到工作，救援机构就会要求他们通过支付价格适中的房租，来承担自己在难民营中的生活费用。1938 年，两所面向那些每月至少能够获得 5 元工资的难民的“自给所”被建立起来，居住其中的难民每月必须支付 0.5 元的房租^⑧。

中国的社会组织是最善于募集难民救援资金的机构。通过在不同行会内部进行协商，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获得了各种认捐。捐款的额度则根据商人的营业额进行计算。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募集资金的办法如下：它们向宾馆征收房费的 5% 作为房捐。至于饭店，如果每张发票的消费金额超过 1 元，它们也会征收 5% 的捐税^⑨。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征收捐税的正式授权。后者表示同意，并指明了适用行业。得益于一种票据体

① 《申报》1937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25 日。

② 《申报》1937 年 9 月 14 日、11 月 14 日。

③ 《申报》1937 年 11 月 8 日、11 月 15 日。

④ Lettre au consul, 23 juillet 1938, AD, carton 91.

⑤ Rapport de police, 17 juin 1938, AD, carton 91.

⑥ Télégramme(?) en anglais, 1^{er} sept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⑦ 《申报》1937 年 11 月 8 日、1938 年 10 月 19 日。

⑧ 《申报》1938 年 10 月 24 日。

⑨ BM, octobre 1938.

系，救济款的募集以一种透明的形式进行：一张票据由募集者保存，另一张交由捐赠机构，票据存根则被送回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存档^①。得益于这种成功经验，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开始通过直接与相关行业公所进行协商，以扩大他们的募捐范围。因此，他们也获得了向糖业征收捐税的权利。商户可以拒绝缴纳，但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将公布那些拒绝缴纳的商户的名单^②。米商、布商、殡仪馆和欧式菜馆都收到了征税的通知^③。一旦与行会达成协议，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就向法租界当局要求授权^④。而相关行业公所将会通知它们的成员，并在正式报告法租界当局之前，在报纸上发布征税广告^⑤。

事实上，就如同警察换防一样，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的征稽员挨家挨户地敲门收取捐税。对于法租界当局而言，这一行动有点像是一个丑闻。然而，它却是一种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被当局和同业公所允许并广泛采用的一种措施。为了避免造成物价上涨，警察提醒法国领事拒绝同意向米商和肉商征税的要求。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保证捐税的募集以商人的利润为基础，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到物价。但警察也建议允许联合会进行一定募捐，以免它将管理难民营的大包袱甩给法租界当局^⑥。无论如何，总领事拒绝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对米商和肉商开征捐税，因为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固定的税收。同时令他吃惊的是一些新的捐税，在没有提前报告的情况下就开始征缴了^⑦。

1939年3月，上海难民救济联合会决定向纺织厂、印染厂和绸缎庄开征“穷人捐”。它的难民救助与节约委员会呼吁市民尽量节约，尤其是节约水电，用于救济难民。广播宣传运动也被发动起来。大量的募捐者被会馆派往街头进行募捐^⑧。在将近6个月的有限时间内，这种办法使维持难民营所需的沉重经济负担，轮流在不同同业公会间分摊。通过这种方式，除了那些已经承担了固定赋税的人和机构之外，所有行业都要为难民救援作出贡献。此外，通过在不同时间，向不同的商业机构募集资金，救济经费得到了长期、有效的保障。

① Rapport de police, 9 novembre 1938, Rapport de police, 21 nov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② Rapport de police, 30 nov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③ Lettre de la FSR, 19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④ Lettre de la FSR, 30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⑤ Lettre de la Guilde des marchands de riz et de la Guilde des marchands de haricots, 11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⑥ Rapport de police, 22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⑦ Lettre du consul, 27 décembre 1938, AD, carton 91.

⑧ Note de police, 10 mars 1939.

结 论

1937年发生在上海的悲剧，仅仅是整个中国社会在日本侵略中所遭受的混乱与动荡的一小片段。中日战争使整个国家的数百万人沦为难民，而从城市的层面来看，它给上海这座城市造成了空前的损失。战争结束后，它只剩下了能为难民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的租界和聚集在租界内仅能为难民提供少量帮助的有钱人。

与1932年的淞沪抗战有所不同，那时租界很好地保持了中立，而没有遭到战火波及。但1937年的战争给租界带来的难民潮，迫使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以维护租界内部的秩序，同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介入难民的救援工作。尽管如此，它们的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团结协作地进行。租界当局的最主要目的，在于阻止数量巨大的难民涌入，并帮助已经进入租界的难民离开上海返回家乡。当局的态度十分清晰，它们拒绝负责难民的救助工作，哪怕只是部分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起源于租界之外，应由中国当局，或中国的社会组织来承担难民救助的责任，而且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本身并非租界的居民。

在1937年，来自国际的援助也显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一方面，由于难民的救援在很大程度上由上海国际难民救济会这一个组织直接领导，它既要负责协调难民救援工作，同时还要直接管理为数众多的难民营。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也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被送往上海。这些来自国际的援助，为上海的难民提供了将近一年的食物，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努力。最后，还必须提到在来自外国的政治、经济支持下，所建立起来的饶神父安全区。我们必须强调这些重要的动员，在上海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果缺乏一种相互合作的精神，这种救援根本无法有效进行。

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协同合作在救援行动中的局限。一方面，中国的组织，尤其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其他一些势力强大的同乡会组织保持着强烈的独立倾向。另一方面，它们的救援模式，尤其是地方同乡会在难民救援中，带有明显的区域选择性。无论如何，必须肯定他们在难民接收和疏散中的迅速介入。我们也必须肯定同乡会在救援资金筹集方面的高效。他们通过同乡会的基金或向会员募捐，筹集到了大量资金。通过上海商会控制着整个上海商界的资产阶级上层，在筹集维持难民营运转的必要资金方面，也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尤其是在国际红十字会宣布无力继续提供援助后。事实上，难民的救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以观察白吉尔教授所指出的，中国

传统社会组织，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和局限时，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适应性①。

战时上海难民救援行动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录。在救援行动中，无疑只有小部分人能够获得来自国际和本地的援助。对于大多数难民而言，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生存和生活问题。我们不能谴责租界当局和救援组织，它们已经做了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所能做的一切。事实上，战时上海对于援助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这座城市能够提供的程度。最后，租界为难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如果缺少了它的存在，很多难民将完全陷于战火之中。在上海历史的这个悲情片段里，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证明了自己完全可以取代一个缺位的国家权力（国民党）和保守的政治势力（租界当局）。它们史无前例的努力，是上海社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标志。然而，上海的经验只是极端条件下的地方性反应，不能因此断言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开始出现。

（作者系法国里昂高师(ENS de Lyon)东亚学院(IAO)研究员；
译者系法国里昂大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

① 在这里使用“传统”这一概念，并非要将“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好相反，我们试图展现这些传统社会组织的历史根源以及地方精英在这种体制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这些机构——尤其是各种不同的地方组织（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的目标和介入的领域在一个似乎不变的模式中不断更新，因此事实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个连续性（从帝国到民国，从乡村绅士到城市精英）。关于清代士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见 Esherick, Joseph, et Rankin, Mary,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the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Rankin, Mary B.,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ankin, Mary B.,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ublic Sphère», *Études chinoises*, 9.2, 1990, pp.13—60. 以及 Shoppa, Keith R.,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82。关于商人组织的变迁，白吉尔的作品无疑是最佳的参考文献，见 Bergère, Marie-Claire, *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Paris, Flammarion, 1986。